

这受难的

This Republic of Suffering

国度

Death and
the American Civil War

死亡与美国内战

Drew Gilpin Faust

「美」德鲁·吉尔平·福斯特 著
孙宏哲 张聚国 译



This Republic of Suffering
Death and
the American Civil War

这受难的国度

死亡与美国内战

[美] 德鲁·吉尔平·福斯特 著
孙宏哲 张聚国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这受难的国度：死亡与美国内战 / (美) 福斯特 (Faust, D. G.) 著；孙宏哲，张聚国译。—2版。—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 7

书名原文：This Republic of Suffering: Death and the American Civil War
ISBN 978-7-5447-6320-2

I. ①这… II. ①福… ②孙… ③张… III. ①美国南北战争—研究 IV. ①K712.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83772号

This Republic of Suffering by Drew Gilpin Faust

Copyright © 2008 by Drew Gilpin Faust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fred A. Knopf, an imprint of The Knopf Doubleday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2-26号

书 名 这受难的国度：死亡与美国内战
作 者 [美国] 德鲁·吉尔平·福斯特
译 者 孙宏哲 张聚国
责任编辑 周璇
原文出版 Knopf, 2008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1.875
字 数 279千
版 次 2016年7月第2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6320-2
定 价 5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025-83658316)

导 读

亡灵的穿越与民族的新生

王 希

死亡是一种无法描述的人生经历,因为生者不曾死过,死者不再生还。然而,生命的终结并不意味着死者从幸存者的世界中彻底地消失。更经常的情况是,死者会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进入生者的记忆之中,延续自己的存在,并左右生者的未来。亡灵能够穿越生死的界限,实在是因为生者的需要。生者为了有意义地活下去,需要构建对死者的记忆,死者因此而得以“复活”,继续与生者的对话。这种“生”与“死”的对话不仅是一种个人或家庭的体验,也往往会被铸造成为一个国家的集体体验,尤其是当公民为了国家的存亡曾做出了大规模的集体牺牲之后。德鲁·吉尔平·福斯特教授的著作《这受难的国度:死亡与美国内战》所讲述的正是这样一种对话的产生及其形成。对话发生在19世纪后半叶的美国,参与者是那些在美国内战中丧生的和从中幸存下来的美国人。

美国内战的近因是19世纪中叶南北区域关于奴隶制是否可以蔓延到西部的争论,远因则可追溯到“建国之父们”对奴隶制问题的一系列妥协。在1860年大选中,反对奴隶制蔓延的共和党人领袖林肯仅凭北部选票便当选为总统,南部蓄奴州对此深感恐惧,宣布脱离联

邦,组成南部邦联,并于1861年4月12日打响了第一枪。林肯则誓言捍卫宪法,保护联邦的统一,发布了镇压“叛乱”的命令,南北之间长达四年的血腥冲突就此拉开序幕。即便在当时,南北双方的美国人也清楚地认识到,这是一场决定美利坚民族未来的生存方式的战争。林肯则看得更远,认为内战将决定民主政体能否在人类文明史上存活下去。为此,联邦和邦联进行了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动员,双方参战人数总共300万人左右,相当于当时美国人口的十分之一。最终在南北双方总共付出了62万人的生命代价之后(新近研究认为应该是75万人),联邦获胜,邦联的分离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遭到否定。但内战带来的更重要的结果却是对在北美盛行了两个世纪之久的奴隶制的废除和对400万南部奴隶的解放。这个战前不曾为双方所想象的结果迫使美国接受一个“自由的新生”——即一个没有奴隶制的美国;战后重建则围绕如何界定新的美国自由创造了一个新的宪政秩序,在关键意义上为美国在20世纪的全面崛起奠定了制度基础。内战因而被称为是美国的“第二次革命”,重建则被称为是美国的“第二次制宪”。

因此,自19世纪末以来,内战与重建一直是美国史研究的热门领域,吸引无数学者在其中皓首穷经,耕耘不止,研究成果只能用“浩如烟海”来形容,要在其中做到创新并非易事。但《这受难的国度》自2008年出版以来却毫不费力地赢得了同行的赞赏和大众读者的喜爱,有人甚至视其为内战史研究的经典之一。作者的名气自然对该书的成功功不可没。1996年出版的《创造之母:美国内战时期南部蓄奴州的女性》曾以极富想象力的问题意识、创意迭出的研究构思、炉火纯青的史料运用以及饱含人文关怀的细腻笔触赢得学界认可,奠定了福斯特在内战史、南部史和妇女史等领域中的前沿学者的地位。毫无疑问,她的治史风格在本书中得到了忠实的再现,但《这受难的国度》真正令人感到眼睛为之一亮、心灵为之一颤的,则是福斯特的选题——“内战死亡”——以

及处理选题的方法,两者都是颇具匠心的。

的确,“死亡”是美国内战最明显、最令人难忘的特征之一。对于经历了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人来说,62万人的死亡也许不是一个令人感到震撼的数字,但对于生活在19世纪的美国人来说,这已经是一个最为血腥的“死亡的丰收”了。直到今天,这个数字在美国历史上仍然具有相当特殊的意义,因为它超过了从独立战争(1776—1783)到朝鲜战争(1950—1953)之间美国参与的所有其他战争(包括两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的总和。按当今的比例,内战死亡的62万人相当于今天美国人口的600万人左右。“内战死亡”的惨烈与残酷还在于它是一场“民主”大家庭内部的自相残杀。为捍卫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南部生活方式,南部邦联在其500万白人人口中动员了90万人入伍,占适龄(15—50岁)白人男性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南部士兵的死亡率也因此大大高于北部,每五个邦联士兵中平均就有一人在内战中丧生。联邦各州动员了大约210万人参战,其中包括将近20万前奴隶和自由黑人,伤亡总数超过南部,但战死士兵的比例是南部的三分之一。突如其来大规模杀戮给生活在19世纪中叶的美国人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生理和心理震撼,普遍的死亡更给南北无数的家庭留下了无尽的悲痛,哀伤弥漫全国,成为一种不可逃避的日常生活体验。福斯特借用19世纪改革人物奥穆斯塔特(Frederick Law Olmstead)的名言“这受难的国度”(this republic of suffering)作为书名,可以说是非常准确地捕捉到了“内战死亡”拥有的那种具有穿透性的影响力。

如何处理“内战死亡”这样众所周知的主题,如何在研究和写作上突破传统的内战史学模式,这是福斯特面临的挑战。在福斯特眼中,62万人的死亡绝非只是一个数字概念,而是一个信息量丰富的历史存在,“内战死亡”则是一个帮助我们理解内战之于美国历史的转换功能的切入视角。从《这受难的国度》的结构来看,福斯特力图追求的是一种立体的叙事方法,将战争史、文化史、社会史和政治史所关注的内容

和使用的材料同时融入叙事之中,遵循“死亡的艺术”(art of death)和“亡灵的业绩”(the work of death)两条时而相交的主线,依序讨论了死亡的发生、死亡的认知、死亡的处理、死亡的利用等四大主题,从而展示“内战死亡”对于个人、家庭、社区乃至国家所产生的具有深刻转换意义的影响。显然,这样的处理是想说明,“内战死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战争死亡,而是一种具有深刻政治含义的死亡,但政治意义并非是一开始就具备的,而是通过战时和战后对内战死者的认知、处理和利用而逐渐演进和展示出来的。“内战死亡”对当时美国的宗教习俗、政治文化、政府责任以及公民与国家的关系都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但民间和联邦政府通过对“内战死亡”的处理最终帮助塑造了一种新型的国家记忆,并将其变成了新的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亡灵以悄然无声的穿越维系了美利坚民族的新生。

福斯特对“内战死亡”之发生的讨论借用了传统军事史的研究成果,指出造成“内战死亡”惨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战争进程中武器的改进、有限的训练、战争秩序的混乱以及战争后期消耗战战术的大量使用等。与此同时,她将士兵对杀戮的态度列为重点讨论的内容。福斯特注意到,绝大多数的内战士兵都没有作战的经验,许多人最初不敢面对,也不愿意参与杀戮,但为了生存,他们必须说服自己无视和平时代的道德规范,必须学会将对手想象成为仇恨的对象。在经历了这样的思想转变之后,士兵往往变成了杀戮的积极行动者。南部白人在面对黑人士兵时,往往受到种族主义的驱使,对后者抱有非常明显的仇视;而黑人士兵在面对邦联士兵时,也往往没有北部白人士兵的种种顾虑,而把与南部邦联的斗争看成是争取自身解放的必然过程。在克服了最初的恐惧和犹豫之后,士兵们对杀戮开始变得麻木,将其视为是一种军人的职责。但福斯特也指出,这种在战场上对人类感情的否定和回避也使存活下来的士兵付出了巨大的感情代价,致使他们在战后许多年内仍无法走出参与杀戮的心理阴影。

内战虽然是一种集体行为,但每个士兵必须单独地面对和承受死亡。在讨论死亡的认知时,福斯特花大量笔墨来描述士兵们的个体经历,讨论他们如何在心理上处理基督教的“善终”文化与死亡现实之间所造成的紧张关系。在这方面,她非常有效地将社会史(对基层人物和行为的关注)和文化史(注重对宗教、习俗和内心世界的研究)与战争史结合起来,通过阅读和解读阵亡士兵留下来的信件等原始材料,剖析和呈现他们对死亡的态度及其转变。内战发生之前,美国刚刚经历了“第二次大觉醒”的宗教复兴运动,南北的宗教气息非常浓厚,基督教的“善终”观——死亡是上帝的意志,如何接受死亡则是人的工作——为人们普遍接受。但福斯特注意到,在面对内战死亡时,无论是士兵还是他们的亲人,并不只是停留在扮演一个“被动的牺牲者”的角色,而是积极参与对“死亡”的解释和应对,对传统的“善终”概念和仪式做出调整,寻求新的“善终”解释,找到新的“善终”方式。这些力图在恐怖与想象中寻求心理平衡的行为都是对战前“死亡的艺术”的修正。

然而,新“善终”方式的创造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拯救活着的人。大规模死亡的突然发生使得死者的亲人陷入束手无策之中,如何减轻失去亲人的痛苦则需要重新解读死亡的意义。死者的遗书和遗言往往充满了士兵为自己的牺牲所想象出来的冠冕堂皇的理由,由家庭和社区领袖写作的悼词也刻意渲染死者的临终遗言,将死者的一生和死亡的意义进行升华。这种渲染对亲人及听众都产生了强大的教化影响,悼念死者也因此成为美国的一种政治文化。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1863)正是这种文化的经典作品。林肯在他的第二次总统就职演说(1865)中对内战的起因和历史意义进行了反思,但在发表演说40天之后就遇刺身亡,这篇演说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了为包括他在内的“内战死者”所写的悼词。这两篇演说在美国历史上可以与《独立宣言》齐名,因为它们将美国从内战中得以幸存的事实与美国人所想象的上帝意志锁定在一起,把美利坚民族对“天定命运”的信仰推向了极致。

“内战死亡”对生者的冲击则更为深刻和长久,引发了19世纪中叶的美国人死亡的本质和死亡的意义思考——死亡是什么,人为何死亡,应该如何懂得和接受死亡等。面对巨大的死亡,人们不再将死亡视为生命的终结或消失,而将其视为一种生命的“穿越”(crossing)或转型。换言之,死者是不存在的,死亡不再可怕;相反,死亡可以是有意义的,死亡也可以是有目的的。新的死亡认知很快被联邦和邦联政府所利用,将士兵之死与政治的需要结合起来,士兵的牺牲被解释为国家幸存的必然条件,人民的受难与民族的新生被铸为一体。通过这样的死亡观的转换,基督教的“善终”与世俗的“爱国主义”交融在一起,构成了一种以追求正义和效忠国家为基础的政治信仰,并通过19世纪后半叶的文学创作和历史写作,变成了一种新型国家主义的叙事,“亡灵的业绩”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宗教与政治通过内战死者而连接起来,相互依存,相互印证,福斯特在这一点上的剖析极为精准,深刻揭示了“内战死亡”对美国政治和宗教文化转型的影响。

对死亡的处理则更为艰巨。战争初期,对阵亡士兵尸体的处理并不被看作是政府的责任,也未被纳入到联邦或邦联政府的军事和财政计划之中。因为“善终”文化的影响,死者的家人发起寻找亲人尸体的活动,希望将死者运送回家乡进行安葬,给死者一个传统的“善终”安排。商业利益乘机而入,从棺木的买卖,到尸体的运送和安葬等,形成了一条龙的商业服务。尸体的防腐和整容甚至一度成为了一桩利润丰厚的商业活动。最初的死者找寻、识别和登记工作,也不是由联邦或邦联政府发起的,而是由两家非官方的民间慈善机构发起和组织的。这些机构的工作者多数并不领取任何薪金,他们深入各地的战区医院,对阵亡者和受伤者进行登记,收集阵亡士兵的信息,并予以发布。到1865年,仅美利坚救济会(United States Sanitary Commission)就已经登记了100万士兵的信息,并回答了来自各地百分之七十的寻人征询。福斯特认为,推动这项极为艰苦的事业的力量来自19世纪中叶包括废奴运动

和“第二次大觉醒”在内的启蒙运动,这些运动帮助营造了新的充满人文主义精神的美国文化。民间组织的行动最终推动了联邦政府对死亡处理的介入。

1863年葛底斯堡战场对阵亡士兵的安葬对联邦政府的介入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这之前,对阵亡士兵的掩埋都是由地方民众自愿承担的责任。1864年,联邦国会建立起国家公墓制度,开始有计划地在主要战场对阵亡士兵的身份进行核实,并将他们予以安葬。这个项目开启了延续至今的国家公墓制度和美国军队的传统。联邦政府的介入,不光是为了对死者表示尊重,而且是为了向死者为之捐躯的原则致以敬意。当联邦国家接手履行原由死者家庭承担的“善终”职责之时,一个新的原则——“亡者的身体属于国家”——便得以建立。依据这个原则,死者及其亲属(乃至整个人民)与国家的关系便发生了质的变化:如果士兵是为国家而死的,死亡就不再是个人或家庭的伤痛,而变成了一种国家的伤痛,需要所有的公民来共同承担,而国家必须对士兵的牺牲予以承认和尊重,国家公墓的建立正是为了给予这种承认和尊重以最高形式的表现。在这个意义上,对内战死者的处理开辟了一种新的人民与国家的关系,造就了一个具有现代性的美利坚民族国家。

但对死者的处理并没有随战争的结束而停止。内战结束之后,联邦政府开创了内战老兵抚恤金制度,向内战阵亡老兵的遗属提供生活支持,同时在国会立法和拨款的支持下,开启了联邦士兵战后再安葬项目。联邦政府极力寻找、核实、登记和安葬每一位在内战中牺牲的联邦士兵,将他们安葬在新建立的国家公墓之中。到1871年时,联邦政府建立了74处国家公墓,重新安葬了30万联邦士兵,其中包括3万黑人士兵(他们被安葬在与白人士兵相隔离的公墓中)。这是战后美国最大的联邦工程,总共花费400万美元。南部也对原邦联士兵进行了再安葬,推动者主要是由妇女组成的私人团体。

国家公墓制度和再安葬项目将无数阵亡士兵变成了国家的财产,

将他们从无名之辈变成了英雄人物。但福斯特指出,这种意义上的“国家建设”并非是事先设定的,内战士兵也并不是冲着这些后来想象所产生的“亡灵的业绩”来献身的。对内战死者的态度和处理方式的转变是随着死亡规模的扩大而出现的,是阵亡士兵、阵亡士兵亲属、民间组织与政府互动的结果。但战后的再安葬项目使阵亡士兵获得了政治上的永生,“内战死者”因此而成为一个集体概念,由此产生出一种不同于个人或家庭记忆的,受国家政治左右的集体记忆。在某种意义上,“内战死者”成为了一个特殊的公民群体,他们静静地长眠于内战战场底下,没有声音,没有议程,也不卷入生者的政治,他们似乎在战后美国政治生活中处于“缺席”的状态。然而,国家公墓构成了他们的“在场”,用福斯特的话说,“内战死者”成为了一种“强大和不朽的”力量,在战后的一个世纪里左右着美国的公共生活。

在《这受难的国度》的结尾,福斯特讲述了1913年在葛底斯堡战役50周年纪念日上的故事。联邦和邦联的白人士兵在当年的战场重逢,一笑泯恩仇,象征着南北之间终于化解敌意,取得“谅解”,“内战死者”(Civil War Dead)从此变成了“我们的死者”(Our Dead)。这个转换发生的时候,正是南部各州明目张胆地大肆剥夺黑人公民的选举权和公民权的时候,也正是美国开始向世界范围扩张美国国家利益的时候,因此显得格外具有讽刺意义。相对于“内战死者”而言,“我们的死者”抹杀了内战原本所表现的“要自由”还是“要奴役制”的严肃的意识形态的对立,混淆了为自由而战与为奴隶制而战的区别,构建起一种以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基础的国家忠诚,制造了黑人和白人拥有的两种不同的美国国家认同。福斯特的故事是精彩的,但到结束的时候却给人一种模糊、仓促和进退两难的感觉——也许这是一种刻意的模糊,意在显示“内战死亡”本身在构建真实而长久的国家认同方面所具有的内在局限性。

致 谢

写这本书的想法,源于我早前一本关于南部蓄奴州的女性的作品。我意识到,她们对这场战争的看法,植根于它那可怕的“死亡之丰收”。这使我的想法成形。我已在这一项目上耗费十余年的时间,这部分是因为除此之外我还承担了其他职责,但同时也是因为,我感觉这个主题太引人入胜了,我希望对它进行彻底的研究。如果说我已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目标,那是因为我得到了许多朋友、同事甚至陌生人的帮助。我首先想感谢那些阅读并评价了整个原稿的人,他们使我避免了一些错误,并为我提供了看待更宏观的概念问题的宝贵视角: David Blight、Ann Braude、Gary Gallagher、Tony Horwitz、Jennifer Leaning、Stephanie McCurry、James McPherson、Luke Menand、Charles Rosenberg 与 Jessica Rosenberg。其他人或阅读了属于他们各自专业领域的具体章节,或帮我寻找图书馆资料,或指导我获得并利用手稿收藏,或同我分享了他们在自己的研究中所获取的宝贵财富,或充任我的研究助理,或帮我准备未刊稿,或以其他数不尽的方式帮助了我。我深深地感激 Michael Bernath、Homi Bhabha、Tracy Blanchard、Beth Brady、Gabor Boritt、Tom Coens、Lara Cohen、Gretchen Condran、John Coski、Yonatan Eyal、Henry Fulmer、Jesse Goldstine、James Green、

这受难的国度：死亡与美国内战

Jenessa Hoffman、Kathryn Johnson、Andrew Kinney、James Kloppenberg、Jeremy Knowles、Lisa Laskin、Paul LeClerc、Millington Lockwood、Chandra Manning、Sandra Markham、Stewart Meyer、Reid Mitchell、Margot Minardi、Lien-Hang Nguyen、Charlie Ornstein、Amy Paradis、Katy Park、Michael Parrish、Charlene Peacock、Trevor Plante、Frances Pollard、George Rable、James Robertson Jr.、Neil Rudenstine、Barbara Savage、Elana Harris Schanzer、Kay Shelemay、Theda Skocpol、Susan Stewart、Allen Stokes、Steven Stowe、Julie Tomback、Helen Vendler 与 Ann Wilson。我也感激 Jane Garrett 的耐心与信任。

我还想感谢：Louise Richardson，在我为写此书而休假的一年中，他暂时代理了我在拉德克利夫研究院的职务；Susan Johnson 与 Anne Brow，她们安排了我的生活；Janine Bestine 与 Peggy Chan，她们保证了我的计算机的正常运行；以及 Lars Madsen，在本书问世前的最后时刻，他承担了如此繁重的工作，但又完成得如此之好。我有幸先后获得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帮助，它们慷慨地支持了我作为一个历史学者的工作；在过去六年中，我从拉德克利夫研究院的思想财富中获得了灵感。在注释中我指出了许多收藏有丰富手稿的机构，我是它们那宝贵财富的受益者，对此我十分感激；我也感谢那些允许我利用本书的一些引文与插图的图书馆与博物馆。本书的一些部分以略微不同的形式发表在了《南部历史杂志》（*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军事历史杂志》（*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与《南部文化》（*Southern Culture*）上。在引用原始材料时，我保持了原始的、常常是非常有创造性的拼写，但没有插入妨碍阅读的“原文如此”（*sic.*）。

Charles Rosenberg 与 Jessica Rosenberg 是了不起的编辑与评论家。但他们知道，我想对他们说的话还有很多。感谢他们这么长时间一直支持这个项目，也感谢他们容忍了我对死亡的痴迷。

2007年1月，于坎布里奇

序 言

关于死亡的工作

人固有一死。“我们都拥有故去的亲友——我们也都将走向自己的坟墓”，在1862年的一场布道中，南部邦联圣公会的一位主教如是说。他解释道，每个时代都必须面对“相似的痛苦”，每个时代也都必须寻求“相似的慰藉”。然而，死亡也并非万人一式。不同历史、不同文化与不同时空中的不同环境，决定着人们走向死亡的方式也有所不同。尽管“我们都拥有故去的亲友”，也尽管我们都终将一死，但在不同时代，在不同地方，我们的离世方式却各不相同。¹

19世纪中叶，在内战的硝烟中，美利坚合众国开启了与死亡的新关系。这场内战被证明为美国历史上最血腥的战争，它也预示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线的屠戮，以及20世纪全球范围的大屠杀。1861年至1865年间罹难士兵的数字估计为62万，这大致相当于独立战争、1812年战争、美墨战争、美西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美国殉难士兵人数的总和。内战间的死亡率，亦即死亡发生的次数同美国总人口的比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6倍。而若将这2%的比率放在今日的美国，则意味着将有600万人死去。在同比它财力更强、人力更足的敌人的对抗中，新的南部国家挣扎求生。其死亡人数也反映出，战争给其人力资本带来了过大压力。南部邦联的死亡率是

他们的对手北方佬的3倍；在到了服兵役年龄的南部白人男子中，有五分之二都未能幸免于难。²

xi 然而，这些军事数据只讲出了部分事实。这场战争也夺去了无数平民的生命：战斗在农场与田野间肆虐，流行病在部队营地中蔓延，游击队员对妇女甚至儿童施加暴力、进行报复，征兵骚乱中的暴徒将无辜平民当作靶子，南方部分地区的食物短缺造成了饥荒。没有人试图系统记录这些死亡，也没有人想出一个办法，来对死亡人数进行回顾性统计。杰出的内战史学家詹姆斯·麦克弗森（James McPherson）估计，有50 000名平民死于这场兵燹；他还总结道，南部总体的死亡率，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任何一国的死亡率，也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除莱茵河与伏尔加河之间区域以外的其他所有地区的死亡率。人们常常感觉，只有在人性泯灭并且科技也极为发达的后来，才会出现美国内战中那样大规模的屠杀了。³

这场战争死亡人数的影响与意义超越了死亡者数字本身。死亡对于内战一代的重要意义也源于，它有悖于关于生命正常终结的普遍预设——谁应死去，在何时、何地以及何种情况下死去。19世纪中叶的美国人并非不熟悉死亡。到了19世纪60年代初，美国的死亡率已开始下降，虽然直至该世纪末，人们的寿命才开始显著延长。尽管如此，紧挨内战之初的那代美国人，仍比他们21世纪的同胞更熟悉死亡。但他们所熟知的死亡方式，却与战争所带来的死亡方式有着明显不同。在内战中，死亡率与死亡经历都发生了剧变。在19世纪中期，美国人虽遭受着高婴儿死亡率的痛苦，但仍期望着多数步入青年的个体至少能存活到中年。然而，战争裹挟了年轻健康者，并快速地、经常是在瞬间用疾病或战伤将他们摧毁。这与当时人们关于谁该先死的预想截然而惊人地对立。正如弗朗西斯·W. 帕尔弗里1864年为联邦士兵亨利·L. 阿博特所作的悼词：“处于人生之黎明者所遭受的打击似乎最为沉重。”
xii 一名士兵死亡的可能性比其如果未参军的情况要高出5倍。在战争中

期,一位牧师对其康涅狄格团解释道:“无论是他还是他们,都未曾有这样一种具有特殊条件和特殊需求的时代生活并面对死亡。”内战中的士兵与平民,都察觉到了战前岁月许多人所谓的“平凡的死亡”同内战期间战场、医院和营地中痛苦且频繁的死亡之差异,也都看到了那种“平凡的死亡”同战争对平民生活的扰乱之区别。⁴

在内战时期的美国,北方与南方都经历了许多战争亲历者所谓的“死亡的丰收”。在战争中的南部,“似乎家家户户都在为某位罹难亲人哀悼”。失去变得极其普通,死亡不再是个人遭遇;死亡的威胁、逼近与现实,成为了人们最广泛的共同战争经历。如一位南部邦联士兵所言,死亡“在方方面面都占有统治地位”——它主宰着一个个家庭与一条条生命,要求人们进行关注与回应。内战对今日的我们来说是重要的,因为它结束了奴隶制,并帮助我们诠释自由、公民身份与平等之意义。它使美国成为一个中央集权化的民族国家,并将它推入经济扩张与影响世界的轨道。然而,对于那些曾在内战中生存过并从中幸存的美国人来说,他们的经历之方方面面都与死神如影随形。在战争结束时,这一共同的苦难将超越长期以来人们在种族、公民身份和国家性质问题上的分歧,使牺牲以及对牺牲的纪念成为南北最终统一的基础。即便在我们的时代,这种内战观——从根本上说,它是伤感主义的——仍有着强大的影响力。⁵

死亡不仅改变了数十万遭受丧亲之痛的个人,它也改变了美国。在描述被运抵弗吉尼亚半岛的联邦救护船的伤员与濒死者时,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指出,战争创造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受难的国度”。牺牲与国家变得相互交织密不可分,平民被迫脱离正常生活参军,这需要这个诉诸武力来定义其目标与政体的国家承担起对他们的责任。一场关乎联邦、公民身份、自由与人类尊严的战争,要求政府去关注那些为国捐躯者的需求。履行这些新被认知的职责,成为了联邦权力扩大的重要原因。而联邦权力的扩张,也正是

xiii

这个在战后被改变了的国家的特征。国家公墓的建立,以及以照顾活人与关注死者为目的的内战补助金制度的出现,所涉及工程规模之大,在战前是很难想象的。死亡——不仅通过保全国家,也通过塑造持久的国家结构与国家义务——缔造了现代美国。⁶

内战期间的美国人经常在文章中写到所谓“关于死亡的工作”。它意味着士兵战斗、杀戮与阵亡的义务,也同时令人联想到战斗的后果:屠杀、苦难与破坏。这里“工作”(work)的用法,包含了工作的过程及其影响,以及二者之间的重要联系。战争中的死亡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它也需要行为与行为者(agents)。首先,它必须是被强加的;19世纪60年代,数百万士兵便全力以赴置敌人于死地。但是,死亡也通常需要人们的参与和回应,需要人们去体验并应对。死亡,以及明白如何接近并忍受生命的最后时刻,这就是工作。芸芸众生之中,唯有人类会有意识地预见死亡;在死亡面前选择如何表现(为死亡方式忧心忡忡)将我们同其他动物区分开来。努力应对死亡的需要,是人性独特的部分。⁷

处理死者也是人们的工作之一。这一职责在字面意义上指的是处理他们的遗体,在比喻意义上指的是消除他们的影响。痛失亲人者努力通过仪式与哀悼将自己同逝者分离开来。家庭与社区必须去修补家庭与社会的裂痕。各个社会、各种文化、各个国家(无论它是联邦还是南部邦联)也必须努力理解并解释无法估量的损失。

xiv 这是一本关于美国内战中死亡之工作的书。它试图描述,在1861年至1865年期间以及战后几十年中,美国人是如何担负起这一历史尚未充分理解或认知的工作。人类并不只是死亡被动的受害者。即便他们是死者,他们也是参与者;他们为死亡作准备,想象死亡,涉险死亡,忍受死亡,也试图去理解死亡。而如果他们是幸存者,他们就必须适应因自己存活与他人死亡而出现的新身份。死亡的存在以及对死亡的恐惧,触及了内战时期美国人关于“我是谁”的最基本认知,因为死亡所带来的生命终结和形体异变之威胁,不可避免地激发起人们的自我审